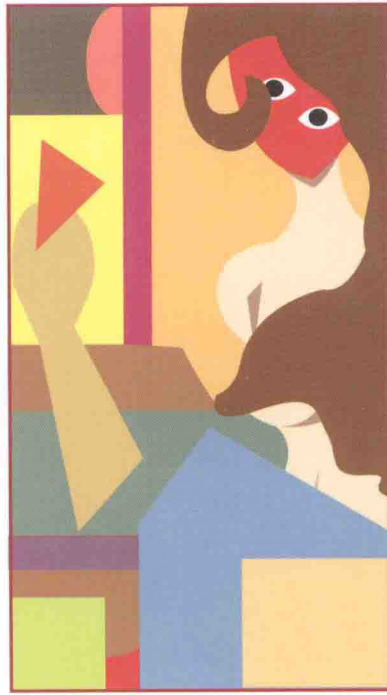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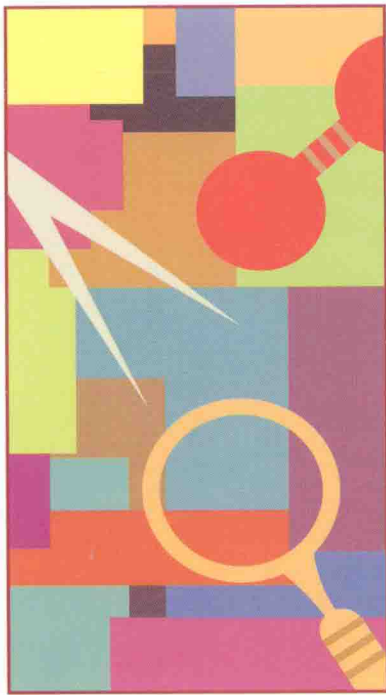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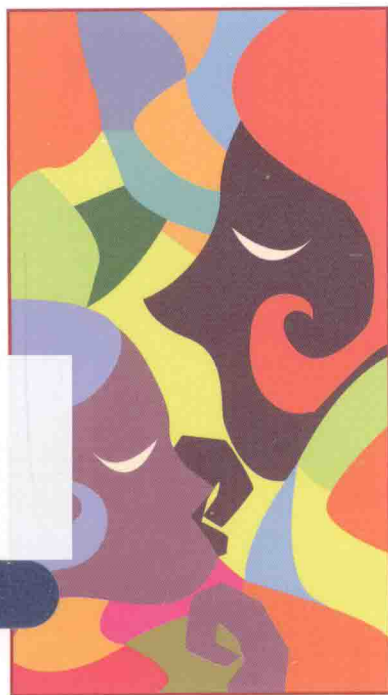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

中西文化比较

(第二版)

李 军 林永清 朱筱新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

中西文化比较

(第二版)

李 军 林永清 朱筱新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比较/李军, 林永清, 朱筱新编著.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1
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8575-0

I. ①中… II. ①李…②林…③朱…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3177 号

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

中西文化比较 (第二版)

李 军 林永清 朱筱新 编著

Zhongxi Wenhua Biji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2015 年 1 月第 2 版
印 张	11.7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3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但人类是以地区、国家和民族而存在和发展的，因而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和特色。

中西方文化由于生存环境、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下，以社会伦理为核心，涉及人文自然万物，体系严谨，内涵深邃，曾对世界各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起步比较晚，主要以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为核心，注重个性张扬和对外开放，尤其在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下，逐渐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多地随着交往与交流传向世界，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所认同和接纳，成为异国文化和人文素养的新源泉。与此同时，我国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来的科技、思想和史学等文化，这些伴随文化交流而来的文化渗透，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必然冲击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有人简单地对中西方文化以“优”与“劣”来区分。有人全盘西化，盲目崇洋，妄自菲薄；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至善至美，盲目自我陶醉，妄自尊大；还有人两种文化调合折中，认为“中体西用”中国就会现代化了。实际上，这些观点都失之偏颇。由此，以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对中西方文化的起源、发展及特征进行科学的比照和研究，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有着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不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许多伟大的贡献，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巨大而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认同感和使命感的精神财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我们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在中西方对比研究中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碰撞迫使每个自觉的民族都要了解和学习其他民族。中国在步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现在还在以一种追赶者的姿态与世界接轨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等不是办法，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于中国来讲，这种比较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科学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树立清醒的文化创新意识和紧迫感，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补充营养，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

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文化现象是纷繁复杂的,虽然中西方文化各自蕴含着自身的内在智慧,也各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但如何廓清其生存土壤和发展历史也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个问题。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时,我们要着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科学地比较中西方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文化特点以及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既要确立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要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把握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和精髓,从容应对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交锋。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西文化差异的形成	3
第一节 中西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	4
第二节 农业生产与农耕文明	7
第三节 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及影响	15
第二章 中西方教育观念的差异	23
第一节 中西方的教育传统	23
第二节 中西方教育培养模式的差异	28
第三章 中西方文化风俗的差异	34
第一节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风俗	35
第二节 中西方节庆文化对比	56
第四章 中西方文化特征对比	65
第一节 平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66
第二节 现实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特色	69
第五章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	71
第一节 风格各异的中西方传统建筑艺术	72
第二节 中西方的园林艺术	81
第三节 中西方的绘画艺术	114
第四节 中西方的音乐艺术	124
第六章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145
第一节 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146
第二节 扬长补短, 兼容并蓄	173
主要参考文献	180
后 记	181



绪 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其中，既有物质的文化，又有精神的文化。这些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和生存环境的认识，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体现了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观念，由此也产生和形成了特定的生活习俗。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也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符号。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特别是经济生产形式及活动内容不同，所创造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形成了今天世界各地多元化的、异彩纷呈的不同文化类型。

其中，中国和以欧洲、北美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尤为明显。这些差异突出表现在观念意识、文化特征、艺术表现手法，以及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差异的形成，绝非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亦属观念意识的范畴，均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能归咎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能简单地从现象去认识，而需要从各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基础入手，分析文化差异的根源及表现。这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认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征，客观分析和评价中西方文化，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有助于从各自的文化中摒弃糟粕、吸取精华。

中国文化通常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进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的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精神风貌，也曾在历史上对世界各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西方文化，一般是对在地理上处于西半球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各国文化的统称。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三种文

化,在中世纪^①统一于基督教的神坛下。进入近代以后,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整体文化。在历史上,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也都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文化在世界上逐渐处于领先的地位。

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因植根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风格,形成了不同的观念意识、文化特征、艺术表现手法和生活习俗。具体表现在民族的整体性格、服装服饰、建筑风格、医学、绘画雕塑、戏剧、音乐、饮食习俗以及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这些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表现,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中西方各自的文化,在历史上都曾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尽管这些文化的产生距今历史遥远,但时至今日依然活跃在中西方的社会生活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应该看到,虽然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别。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采取妄自菲薄或夜郎自大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也是有失公允的。

文化现象,是观念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是不同观念意识的反映。因此,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需要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必须立足于广义的社会基础,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等诸多要素,这是分析和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前提。

不过,中西方文化在各自形成的过程中,因受历史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在认识和理解中西方文化时,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正确分析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从根源上认识消极成分产生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其弊端所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交流更加密切、频繁。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越来越多地随着交流和交往传向世界各地,正逐渐被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所认同、接受和吸收,成为异国文化和人文素养的新源泉。与此同时,我国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来的文化,其中就包含大量的西方文化。因此,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应抱着积极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审视西方文化,从中吸取有益的因素和成分,扬长补短,促进自身素养的提高。这正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和希望。

^① 中世纪 (Middle Ages),是指古典文化期(希腊、罗马)与古典文化“复兴”期之间的时代,为公元四五世纪至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前。历史学以该名词作为欧洲封建时代的通称,即指处于欧洲古代奴隶制与近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一般具体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上限),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下限)。

中西文化差异的形成

内容提要

1.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显而易见，缘于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原始人类制作工具的技术从打制进步到磨制，劳动的收获物数量增加，开始出现剩余。东西方在这一时期都产生了原始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但在以后的历史中，西方的畜牧业发展迅速，正是受两种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影响，东西方民族在观念、意识和文化等方面便出现差异。

2. 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源自农业生产的特点，即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作物生长规律性强、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和劳动地点固定等特点，决定了农耕民族特有的观念和意识。

3. 游牧民族的观念和意识则源自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即人在畜牧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畜牧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流动式放牧及放牧的方式灵活等特点，决定了游牧民族特有的观念和意识。

学习提示

本章分为三节，分别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农业生产对农耕民族的影响、畜牧业生产对游牧民族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中西方文化差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社会经济基础入手，探讨和揭示其对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影响。

其中，需要理解和把握的关键点如下：

一、中西方的人类均由类人猿进化而来，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都采用打制技术制作工具，都从事采集和狩猎劳动，在进化过程中并无差异。中西方观念、意识及文化的差异，实际出现于原始农业与畜牧业产生后。

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源自不同类型的生产劳动。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东西方民族各自在观念、意识和文化上传统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和表现。

三、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的特点,是导致中西方民族在观念、意识和文化上产生差异的根源,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众所周知,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些差异具体体现在中西方民族的基本素质、整体民族性格、社会观念意识、心理特征,以及饮食习惯、服装服饰、文学作品、绘画雕塑、建筑风格、戏剧、音乐、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

李政道博士在1997年的中美文化交流研讨会上,有一段发言,提到了中美文化传统的差异问题。

中美文化传统的区别是明显的。中国文化传统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美国正相反。在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往往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有利于激发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但这种观念也导致滥用自由。现在美国乱象丛生,不能说与此无关。

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文化,包括传统的观念、意识,正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以社会为重”的传统道德和修养。这一点,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西方政界和新闻媒体所肯定。

第一节 中西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

一、人类的起源和原始文明

人类是从高级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的,即从泛称类人猿的人类始祖进化而来的,这一点已被现代科学所证明。所以现代人身上仍保留着许多灵长目动物的特性和生活习性。如杂食性的食物构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规律等。

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原始人类即猿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能否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猿人,还是欧洲、非洲及美洲发现的猿人,在他们生活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及遗存,都反映了早期人类的文明,即能够运用相互撞击、敲打的办法,将石块制成工具。所以,生活在中国和西方的原始人类,并不存在体质、大脑及思维等方面的明显差别,而且都沿袭着灵长目动物的本性和生活习性。

为了满足杂食性食物构成的需要,猿人都以自然界中生长的植物茎、叶、果实和动物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为了获取这些食物,猿人从事着最原始的劳动——采集和狩猎。所以原始人类的采集和狩猎劳动,其实质是灵长目动物本性的反映。

在相同的生活和劳动中,世界各地的猿人并没有出现本质的区别,如各地猿人普遍采用的工具制作技术是打制技术;同样进行采集、狩猎劳动;都生活在自然形成的山体洞穴

中，过着群居生活；等等。各地猿人遗址出土的文物及遗存还证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劳动，人类的体质不断进化，脑容量逐渐增大，并且对自然环境有了较强的适应性。同时，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各地的猿人都逐渐认识到了自然变化的规律，有意识地躲避自然灾害给自己造成的危害，逐渐提高自己生存的能力。这样，人类才得以繁衍生息，逐步扩大种群，并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逐渐形成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种群落。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原始社会早期，中西方的原始人类并没有出现差别。也就是说，中西方民族及文化传统的差异，绝非从人类诞生之时就产生的。这表明中西方文化出现的差异与人种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蒙古人种（黄种人），还是欧洲人种（白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等人类种群的分支，其早期先民根本不存在文明程度的优劣差异，所创造的原始文化也没有本质的差别。文化差异的产生，则是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主要受各自的经济生产，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与影响的结果。

二、中西方人类差异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劳动、生活实践中，中西方的原始人类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提高劳动效率的可能性。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原始人类自有意识地开始制作工具后，就不断改进劳动工具的制作技术，逐渐以磨制技术取代打制技术。

采用磨制技术加工制作的石器工具，其性能较打制成的石器工具更加优越。如工具的刃部更加锋利，尖端更加锐利。更重要的是，磨制技术还能够加工质地更加坚硬的材料，从而进一步提高工具的使用寿命和性能。所以在广泛使用磨制工具后，人们的劳动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采集和狩猎劳动所获得的食物，也因此逐渐增多，除供人们日常食用外，还出现了剩余。

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改进导致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而引发了人们观念、意识的改变。

当劳动剩余产品出现后，人们又设法保存这些采集到的果实和捕获的猎物，以备食物匮乏时再食用。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人们发现散落在地面上的一些植物果实经过寒冷的冬季，在气候开始转暖的时候，又会萌发出幼芽，长成新的植物，还能再结出果实。于是，人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受到启发，便尝试着将剩余的果实埋入土中，以使其再生长出新的果实，这样就产生了原始的种植业。而对于在狩猎中生擒的猎物，由于数量增多，也出现剩余。人们为了能在缺乏食物的时候再食用它们，便将它们圈起来，避免它们跑失。为了不让这些被圈的猎物因没有食物而死去，人们又尝试着进行人工喂养，从而产生了原始的饲养业。经过长期的人工圈养，这些动物的野性逐渐衰退，性情逐渐温顺，最终被驯化成能人工饲养的家畜、家禽。

事实上，人类社会进入新时期时代以后，东西方都产生了原始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尚未出现明显的差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欧亚大陆的一些部族认识到家畜不仅能够提供肉食，还能提供乳类以及皮毛等。而与种植业相比，畜牧业生产还具有劳动相对简单，需投入的人力、精力较少，劳动强度较低，特别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对较小等特点，所以

这些部族便以从事畜牧业生产为主，而辅以种植业。^① 这在欧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如西欧的阿齐尔文化、塔德努瓦文化，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新石器文化，希腊的迪米尼文化，东东南部的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文化等诸多新石器文化遗存中，都发现数量较多的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骼。正是因为饲养牲畜，不仅可以提供人们所需的食物，还可以提供生活所需的纺织物原料，所以在以后的历史中，欧洲的畜牧业始终十分发达。

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黄河、长江流域的黄土高原、江汉平原及东南丘陵等广阔的区域已经发现大量的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均位于河流附近，或临水而居，或是在河岸的高地上。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利用自然条件，为自己创造安全、便利的生活条件。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的粟黍稻等作物遗存、稻田遗迹，以及猪、羊、牛等动物骨骼，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从事粮食作物的种植，并饲养牲畜。在一些保存较完整的聚落遗址中，还有圈栏的遗迹，说明当时的人们是采用圈养的方式饲养牲畜的。人们将牲畜圈在栏内，既可以防止牲畜外逃，又能有效防止牲畜噬食和践踏粮食作物。

从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遗迹、遗存中可以看出，粮食作物的种植在聚落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牲畜饲养业则居于次要和辅助的地位。这也与当时的人们较好地利用自然条件、精心种植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种植业便成为聚落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在以后的历史中，人们为了满足聚落不断发展、壮大的粮食需求，积极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从而促进种植业的持续发展，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农业，因此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农业与畜牧业这两种生产形式是不可能同一地区并存的，因为这两种经济生产形式具有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农业需要开垦土地，致使牧场面积减少，影响放牧；畜牧业的放养，又会对种植业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生活区域内，为解决植物类食物的来源问题，多采用小片区域集中种植的方式。欧洲中世纪出现的庄园经济，就属于种植业的性质，但它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而在农耕民族生活的区域内，家畜则多采用圈养的方式。即使放牧，也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如田头、山林、旷野等没有种植作物的区域。于是，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便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的农耕文明区域和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的游牧文明区域。因此在世界历史上才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以农业生产为主；历史上的欧洲、中亚等地区，畜牧业生产占有很大比重。

在以后的历史中，随着国家的建立，农耕区域的扩大，畜牧业生产的范围不断缩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在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征战。欧洲古代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多缘于此。为了防止畜牧民族的攻掠，农耕民族便采用修筑城堡的方式，但最终往往还是被畜牧民族所征服。虽然也有许多畜牧民族在原来的农耕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后，逐渐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或在以后的历史中，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逐渐缩小游牧的区域，但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习俗和观念、意识，依然牢固地存在

^① 参见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章“生产的技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 21 世纪（第 7 版）》，第二章“食物生产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并延续着，对国家政权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

尽管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很难寻觅到国家建立前的畜牧生产方式，但由于中西方早期人类所从事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已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思想、观念、意识，以及文化艺术、生活习俗等文化传统，早已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头脑和潜意识中，至今依然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

第二节 农业生产与农耕文明

一、主业与副业

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我国在公元前 8000 年左右开始走上农业生产的道路。粮食作物由此便成为维系人们生存的主要食物，这也成为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即以稻谷为主食。农业生产在我国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中华民族也因此对农业生产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认识。诸如“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等。

由于农业生产与人们的生存直接关联，所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视农业为本业、主业。不过，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本业、主业的“农业”，绝非今天广义的农业概念，而仅仅是指粮食种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中国古代的封建政权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

与此同时，由狩猎劳动演进而成的家畜饲养业，以及从采集劳动分化、衍生而成的园艺种植（蔬菜、果树栽培）业，则退居于辅助性劳动的地位，以弥补主业生产的不足，因而被人们称为副业。

这种对农业生产的认识，也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习俗。在中国传统的饮食观念和习俗中，凡主业生产的粮食，就被统称为主食，主要用于填饱肚子。而副业生产的产品，就被统称为副食，主要用于调剂口味。主食与副食，这一对特定的饮食称谓一直延续至今，足以说明农耕文明对后人所产生的影响之深。

主业与副业，这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认识，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为了生存和适应环境而创造出的原始文明。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业作为主业，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农业生产始终受到社会的重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采取的“劝课农桑”、“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等政策，都反映了农业的受重视程度。

因为农业生产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必然会对社会生活产生一系列影响。同时，在农业生产中所形成的一些观念和认识，也必然会对农耕民族的整体素质、性格、心理特征、观念意识甚至传统文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进行化分析，必须着眼于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规律中探寻和揭示其对农业民族所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即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诠释农业生产与农耕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

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传统文化的本源，展示其原貌。

二、农业生产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农业生产是以在土地上种植作物的方式进行的，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也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一，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与季节的变化关系密切。春播秋收，春华秋实，“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传统说法及农谚，反映了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

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大自然的变化规律，适时劳作，绝不能延误农时，否则，就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农业生产种植的各种作物，从播种、出苗、拔节、分蘖、抽穗、灌浆到成熟，都有其各自固定的生长周期，即农作物生长具有规律性强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者必须严格按照作物生长规律，适时从事相应的劳动，如松土、间苗、除草、浇灌、施肥等，以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条件。

第三，降水、光照、温度等气象因素，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收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还具有极易受气候和天气影响的特点。

第四，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土地上进行的，而土地是无法移动的。因此，农业生产还具有劳动地点固定的特点。

自原始种植业问世以来，人们再也不必漫无方向地四处采集、狩猎，到处寻觅食物。只需在开垦出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进行耕种，即可以满足对生活及生产资料的需求。

由此可见，季节性强、作物生长规律性强、受气候和天气影响大和劳动地点固定，是农业生产所具有的四个显著特点。正是这四个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耕民族所特有的素质的养成，观念、意识和性格特征的形成，以及文化特征的形成。同时，农业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还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由本民族的文化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因受农业生产的影响和作用而形成的农业民族所特有的素质、观念和意识、民族整体性格特征，以及农耕文明所具有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在中华民族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充分。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和作物生长规律性强的特点，反映了自然规律决定农业生产活动这一基本准则。自然规律是无法人为改变的，农业生产者只能严格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去从事相应生产劳动。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或对自然已提供的条件进行改良或改善，或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自然规律带来的不利影响。任何仅凭主观意志和意愿力图改变自然规律的做法，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揠苗助长”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由于必须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不能凭借主观意志去改变自然规律，所以中华民族养成了安分守己、恪守本分的心理素养，并且具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的能力。任何强求他人、使人感到勉为其难的行为，都被视为是缺乏修养和道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反映了这种认识。

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规律，因此按照季节变化和作物生长的规律适时进行相应的生产劳动，是保证农业收成的首要条件。因此，农业生产要求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环境，

以保证各种生产劳动不误农时。祈盼平安、向往和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矢志不渝的追求。由此也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共识，以及“求稳”的社会心态。

农耕民族共同遵循着同一个自然规律，共同承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种种恩赐和磨难，由于人们有相同的遭遇、磨难和挫折，也有相同的企盼、希望和利益，因此人与人之间极易沟通，且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在此基础上，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也极易达成共识。而一旦达成共识，人们便会自觉遵守和维护它，从而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由于天气和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人们更希望能预知气候和天气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和危害。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总结天气和气候变化的规律，积极探索自然变化的前兆。这种探索绝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探索过程和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因为生存的需要，人们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中重新振作精神，继续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长此以往，就养成了中华民族善于总结经验、不屈不挠、勇于探索、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质。不断的总结和探索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诸多领先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明，中华民族也因此被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誉为勤劳智慧的民族。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人创造出许多伟大的文明，说明中华民族是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但与此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又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所以包括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在内的诸多发明，实际上都不是创新出来的，而是在不断总结前人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而问世的“发明”。曾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四大发明”，实际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改进的过程。

以指南针的发明为例，远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使用“司南”来指示和测定方向（见图1—1）。这说明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磁铁的性质，懂得将磁铁加工成勺子形状，其勺柄一端即可指向南方的特性。但直到1300年后的宋代，人们才将磁铁制成针状，发明了“指南针”，可以更加方便地携带和使用。从磁勺到磁针，只是形状发生了变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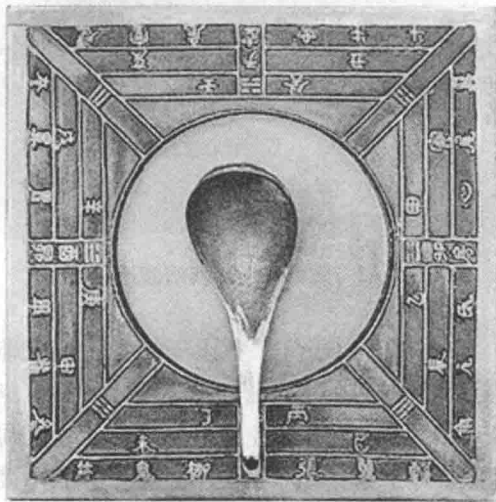


图1—1 司南

使用的方式和性能上，虽更加便利、快捷，但其实质却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这样一个变化，却经历了1000多年的探索过程。其他的古代发明，如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也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探索过程，才最终定型化，成为一种“发明”。显然，这种“发明”是基于对经验的总结、完善和改进的，因此从最初的发明到后来的实际应用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与过于重视经验而导致思维定式，进而缺乏创新意识，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当欧洲兴起工业革命后，中国此前在科技上领先于世界的地位便逐渐丧失。这一事实也告诫后人，我们必须在勇于探索的基础上，增强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我们的祖先远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就已经烧制出陶器，并用其来煮烧食物。在使用

陶器煮食时，还认识到水沸腾后，能产生蒸汽；水蒸气的温度很高，可用于蒸熟食物，于是又发明并制作出甑（见图 1—2），将它套在鬲上，就可以利用水蒸气来蒸熟食物（见图 1—3）。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发明的用水蒸气加工食物的方法，成为一种经验，被后代所沿袭。在青铜时代又制成青铜甑、青铜鬲，直到铁器问世后，又逐步发展为由笼屉或算组合成的蒸锅，但始终是在利用水蒸气的热量，却没有从水烧开沸腾，冒出水蒸气的现象中，认识到水蒸气可以作为一种动能，替代人力和畜力，而使人类不直接依赖于自然而获得更方便、实用的能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民们在审视客观事物时，思维受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制约，而缺乏大胆的推测和设想，创新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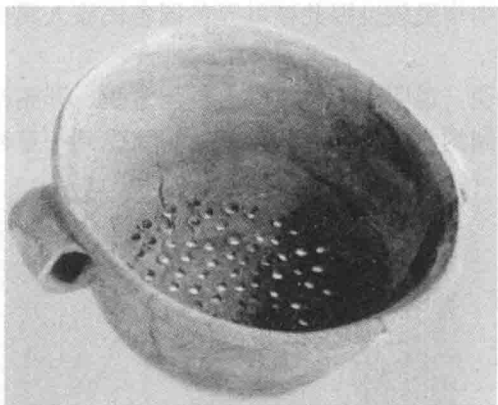


图 1—2 陶甑（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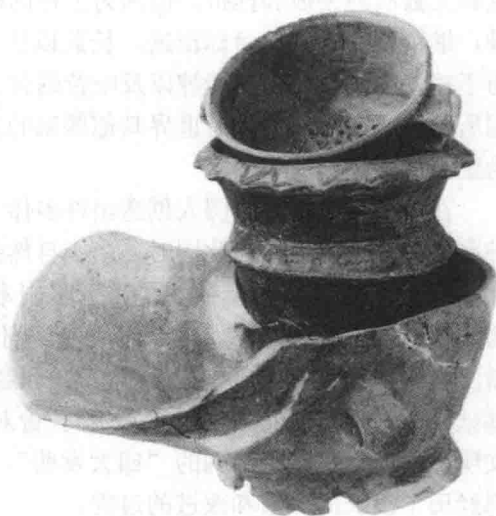


图 1—3 陶甑（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此外，由于气候和天气的变化是很难预知的，所以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思维定式，即“居安思危”。每当风调雨顺，丰收之后，人们考虑的不仅是如何享受，而是第二年，甚至更远的将来，是否会继续风调雨顺，再获丰收；万一遭受天灾或人祸，将如何渡过等问题。人们考虑、审视问题的角度，并非拘泥于眼前，而是着眼全局和长远利益。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也立足于“居安思危”、“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等。

这种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思维定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如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往往是以战略为主，战术服从于战略。如《孙子兵法》中提到的“三十六计”，即通过具体的战术和策略，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和胜利。与之相通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娱乐游戏——围棋。围棋的棋盘，在中国古代称为“局”。棋手在棋盘，即“局面”上布子（摆放棋子），亦称为“布局”。具体的“布局”位置，则是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先从“布局”入手，获得“局部”的优势，最终取得“全局”的胜利。源于中国围棋的“局部”、“布局”、“全局”等名称，实际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急功近利，反对因小失大，提倡集体主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这

也正是“全局”意识的集中体现。

“居安思危”的思维方式，也成为古代家庭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人们居庭过日子需要“量入为出”，即要根据自己或家庭的实际收成（收入），来考虑和决定支出（消费）。在考虑支出时，也是从“全局”和“长远”出发，来权衡各方面的实际需要，最终确定支出的先后、主次和多少。这种“先攒钱，后消费”的消费模式，实际上就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滞后消费”理念的体现。

在古代，人们往往是被动地、消极地承受气候和天气的变化，而气候和天气的变化，又经常与人们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人们企盼风调雨顺，但往往等来的却是大旱、大涝、霜、雹等恶劣天气。长此以往，中华民族养成了承受能力强，善于忍耐和克制的素质。在困境和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气候和天气的变化，特别是恶劣的气候和天气，往往给人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相同的经历、挫折和磨难，也使人们感到同病相怜，中华民族因此极富同情心、怜悯心，进而养成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优良品德。同时，与大自然抗争，是出于人们的共同利益，因为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大自然抗争的，所以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群体的力量，认识到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合作，这使得中华民族特别强调整体性原则和共性原则，自古以来就具有很强的团结意识和凝聚力。

在“稳定”的社会共识和“团结”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认识到要维护“稳定”和“团结”，必须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一种友善、和睦、互敬互爱的关系，所以和善、和睦、和平、和谐等，就成为人际交往的准则。与人为善、与邻为友，以和为贵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和美德。

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土地上进行耕种，劳动地点是固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定居生活。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临河而居（见图1—4）。他们在临近河边的高地上，用掏、挖的办法建造房屋，建立起自己的聚落。原始种植业出现后，人们再也不必到处去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而可以在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地方长期定居下来，生活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人类最早定居生活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家族为单位的。最初是以母系血缘，后来又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将属于同血缘的人们维系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血缘家族，即所谓的“聚族而居”。一个血缘家族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生活，组成家族聚落。在我国从古至今的地理行政区划中，最基层行政区划的“村”或“庄”的形成，即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许多村庄是以姓氏命名的，这反映了血缘家族与村庄形成的关系。

由于人们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地域环境的关系也是相对稳定的。故友难分、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等中华民族特有的乡土观念、乡亲观念的形成，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民族尤其重视亲情、友情。异地闻乡音，便会倍感亲切。这种稳定且牢固的人际、家庭、社会及人与地域的关系，也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更重要的是，土地是农业生产资料，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源。一旦丧失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计，将难以生存。所以古人视土地为生命，倍加珍惜。而“聚族而居”又使家族聚落与土地结成牢固的关系，家族聚落既是土地的共同拥有者、使用者，也是保护